

学术

最新修订版

[德] 马克斯·韦伯 - 著

王容芬 - 译

与

天降之任

政治

Wissenschaft
als Beruf

Politik
als
Beruf



学术

最新修订版

与 ————— 天降之任

政治

[德] 马克斯·韦伯 - 著
王容芬 - 译

Wissenschaft
als Beruf

Politik
als
Beruf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降之任：学术与政治 / (德) 马克斯·韦伯著；王容芬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117-3557-7

I. ①天…

II. ①马… ②王…

III. ①社会学－研究

IV. ①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1265 号

天降之任：学术与政治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责任编辑：盛菊艳

责任印制：刘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147 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18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https://weibo.com/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阁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2012 年三版译序

1971年底出生的K.T.古腾贝格男爵出身政治世家，同名祖父曾为联邦总理府次官长，夫人的曾祖是铁血宰相俾斯麦。古腾贝格本人的政治人缘比血缘和姻缘更佳：31岁起连续三届被选民直选为国会议员，2009年，古腾贝格先后出任联邦经济部长和国防部长，政绩可圈可点。《明星》周刊2009年6月的民意测验表明，61%的人对经济部长古腾贝格的工作满意，这是德国历史上民意对一个经济部长最高的评价。^①调任国防部长后，古腾贝格身先士卒，甚至偕夫人去阿富汗劳军。前任和部下造成的一件件棘手问题考验了他的工作能力和应变素质。在保证士兵安全的前提下，他推行了前所未有的军队改革，精兵简政，改义务兵役制为募兵制，大刀阔斧关闭国内兵营，减砍装备。抵制来自各方：关闭兵营减少了地方收入，遭到地方政府抗议；德国的义务兵中有相当多的人服民役，是医院、护理机构的无偿劳力，取消义务兵役制遭到的抵制可想而知；反对党为了拉选票，更以国家安全为由竭力攻击军队改革。在巨大的压力下，改革方案义无反顾，古腾贝格树敌，联邦政府受益，仅去年一年，就省下10亿欧元的国防开支。这样一位政坛新

^① 参见Stern.de, 2009年6月12日政治家民意指数专栏：“政坛新秀古腾贝格”。
<http://www.stern.de/wahl-2009/umfrage/politiker-beliebtheitsskala-guttenberg-ist-der-shootingstar-703451.html>。

秀理所当然成为媒体焦点人物，根据 2008 年 11 月—2010 年 4 月的媒体调查，《明镜周刊》和《南德意志报》每隔一期就有一篇有关古腾贝格的报道或采访，《焦点》杂志和《时代》周报有关他的报道间隔比例为 40%，《法兰克福汇报》为 1/3。百姓喜闻乐见的《小报》和新闻杂志《焦点》对古腾贝格更是爱护有加，后者十篇里有九篇是褒文。^①

贵族出身的企业家古腾贝格选择了以政治为业，成为德国战后第一个卡里斯马领袖人物，却因为学术问题丢官弃职。今年 2 月 16 日，古腾贝格博士论文涉嫌剽窃见诸媒体，论文多处引文未注明出处。联邦总理默克尔 2 月 21 日出面支持古腾贝格，称“古腾贝格先生是一位优秀的国防部长。我请他入阁，是作为国防部长，而不是助教或什么有博士学位的教学人员”^②。2 月 23 日，拜伊罗特大学撤销古腾贝格的博士学位。3 月 1 日，古腾贝格在不能承受的压力下辞去国防部长职务，同时放弃了联邦议会席位。此后，他分别向所有被他引用而未注明出处的作者致信道歉，^③但否认“蓄意剽窃”。5 月 11 日，拜伊罗特大学公布的调查结果认定古腾贝格在博士论文中有故意舞弊行为，明显粗暴违犯良好学术实践的准则。论文中有的地方构成了剽窃，古腾贝格重置原文、改动语法、使用同义词或者不注明引文出处，其前提是蓄意欺骗。^④

拜伊罗特大学对学术实践的理解与韦伯不尽相同，按照“以学术为业”里的说法，完成教授论文、取得授课资格并开了课才算开

① 参见 Petra Hemmelmann, 媒体的宠儿 Der Liebling der Medien, 载 TAZ Online, 25. February, 2011 年 2 月 5 日。

② 参见 <http://www.faz.net/s/Rub0D783DBE76F14A5FA4D02D23792623D9/Doc~E97F3B6F0DC0D497191DB95BA55D3037~ATpl~Ecommon~SMed.html>。

③ 参见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750521,00.html>。

④ 德国电视一台 5 月 6 日新闻联播提前报道了报告主要内容：www.tagesschau.de/inland/guttenberg886.html。

始学术实践。做博士学位是受教育阶段的事，古腾贝格花六年写了博士论文，但没在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过一天，选择了以政治为业，却栽在学术伦理上。拜伊罗特大学的结论一出，有人便以剽窃受害者的身份投诉检察机关，试图把古腾贝格打成刑事犯，让他永远回不了政坛。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法律专家盖依思却认为：“我看不出这能阻止古腾贝格重返政坛。拜伊罗特大学的判决有一定的分量，但没重到能堵住古腾贝格回来之路。”^① 在民主国度，政治人物的命运最终还要选民说了算。2009 年的国会大选中，古腾贝格以 68.1% 的高票当选，蝉联三届。下一届如果古腾贝格出来竞选，民意会如何？乍暖还寒的五月，古腾贝格 T 恤衫已经占据了夏装市场，配的文字有“古腾贝格二次革命”、“古腾贝格回来”等。人们在呼唤德国久违了的卡里斯马。

古腾贝格本人尚未对拜伊罗特判决表态，似乎有难言之隐。笔者曾经考察过韦伯在学术实践中受到的惩罚，也只能用“难言之隐”四字来表达。

比起六年写出一本博士论文的古腾贝格来，韦伯进入学术实践真是走了捷径。拙著《独裁与霸权——从历史、作者生平和著作史角度分析马克斯·韦伯的卡里斯马蓝图》^② 曾质疑韦伯写教授论文《罗马农业史对公法和私法的意义》的时间：从 1889 年 10 月动笔到 1891 年 5 月向出版社交稿，总共一年零七个月，这期间韦伯社会活动频繁，出席第一届新教社会大会、参与编辑《新教世界》和《新教社会时代问题》两份报纸、受社会政治协会委托调查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状况；此外还要准备陪审员考试和去不莱梅、哥廷

^① 德国电视一台 5 月 6 日新闻联播提前报道了报告主要内容：www.tagesschau.de/inland/guttenberg886.html。

^② Cäsarismus und Machtpolitik: Ein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Charismakonzept, Duncker & Humblot Press, 1997.

根、莱比锡等地求职，另外还参加了八周军训，剩下能集中用于写论文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了。迄今能够看到的与教授论文有关的韦伯手稿只有 1889 年 10 月抄录的 31 页引文，其中 13 页引自拉赫曼的《罗马土地测量员文集》。^①到了 1891 年 3 月，韦伯还写信给建议他做教授论文的赫尔曼·鲍姆加滕，表示毫无兴趣写这样的书。^②教授论文的出版克服了柏林大学法学系的阻力，使韦伯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然后获得国民经济学教席。然而，学术生涯之始也成为韦伯患病之始，日益严重的神经衰竭症使他不能上课。16 个学期挂着国民经济学教授之名，又上不了课，最后韦伯不顾家人反对辞去教授职务。那本教授论文为韦伯敲开了学术生涯的大门，最终却成了一块沉重的不能再沉重的封墓石板，韦伯的自裁不比古腾贝格所受的制裁轻松。可喜的是，释去重负，韦伯的病好了；失去了大学丰厚的收入，赢得了自由写作的时间。他的传世之作全部产生于不做教授的年代，这之前，除了生病，只有两篇无足轻重的短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韦伯生命的重心移到政治上。战争第二天，50 岁的韦伯就放下手里的儒教与道教研究，投笔从戎，参与建立海德堡野战医院。次年野战医院解散，韦伯退役，选择了以政治为业。参与组建德国民主党，起草呼吁书，发表演讲，大量政论文，包括长篇宪政论文，成于“一战”期间。^③战后，韦伯关注德国的国家形式，主张修宪，变普鲁士一统制为联邦制，在民选议会

① 参见 Cäsarismus und Machtpolitik: Ein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Analyse von Max Webers Charismakonzept, Duncker & Humblot Press, 1997, pp.81–83.

② 参见爱德华·鲍姆加滕主编：《马克斯·韦伯其人其作》，蒂宾根：J.C.B. 莫尔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76 页。

③ 这些论文和演讲稿收集在《马克斯·韦伯全集》第 15 卷《论战争中的政治——1914—1918 年间的文章与演讲》里。

之外另设“州院”，通过直选总统树立对议会的卡里斯马权威。^①他曾有意代表德国民主党竞选国会议员^②，玛利亚娜·韦伯直言不讳：“韦伯有卡里斯马，如果被人们直接选为政治领袖，他会视为他久久等待的‘天降大任’。”^③

玛利亚娜·韦伯的诠释不仅提供了历史假想的空间，也提供了解读本书的两篇演讲的密码：无论学术之业还是政治之业，都是伦理之业。在“以学术为业”演讲中，韦伯将献身学术和献身政治提到了人格的高度：“在学术领域中，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不仅学术领域如此，我们尚不知，哪位伟大的艺术家没有献身于自己的事业，而是干别的名堂。说到艺术，纵然像歌德这样的大家，当他冒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作品时，在人格上也受到了报复。谁要是怀疑这点，那么，为了以身试法，他只好当一次歌德。至少，每个人都承认，即使歌德这样的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大才，也不能不为这种冒昧付出代价。在政治上，也是这样。”只有付出过代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肺腑之言。“以政治为业”的演讲则是韦伯对时代的表白：他选择了以政治为业。这是1919年1月28日。4月，韦伯被任命为慕尼黑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接替退休的卢约·布伦塔诺；5月又被任命为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凡尔赛会议，为保护德国的利益和民族尊严多方奔走；6月正式重返讲坛。一学期下来，旧病复发。一年前在维也纳大学那一学期，他已经承认：“我天生是拿笔杆子、登台演说的，

^① 参见玛利亚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蒂宾根：J.C.B.莫尔出版社1984年版，第650—652页。

^② 参见菲根：《马克斯·韦伯》，王容芬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36页。

^③ 参见玛利亚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蒂宾根：J.C.B.莫尔出版社1984年版，第654—655页。

不是上讲台的料。经验固然痛苦，但明白无误。”^①

德国韦伯全集出版委员会编辑部艾蒂·韩克博士阅读此文初稿并纠正了关于韦伯赴慕尼黑大学任教的时间错误。在此谨致诚挚谢意。

2011年5月识于威斯巴登

2011年12月12日，负责数字议程的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尼丽·克略斯宣布，她已聘请古腾贝格加盟欧盟“持续战略”旗下的“如何长期支持专制国家的网民、博客作者和网络活动家”项目，担任外交事务顾问。“欧盟委员会顾问”一职是义工性质，名副其实以政治为业。

2012年7月又识

① 玛丽亚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蒂宾根：J.C.B.莫尔出版社1984年版，第625页。

2008 年再版译序

1917 年 11 月 7 日和 1919 年 1 月 28 日，韦伯应自由学联巴伐利亚分部邀请，在慕尼黑作了主题为“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的演讲。这是巴伐利亚自由学联组织的系列演讲中的两篇，学联原计划将所有演讲汇编成集，但没做成。出过韦伯博士论文和教授论文的 Duncker & Humblot 出版社为两篇演讲出了两个单行本，付印前作者悉心按照记录修改过，某些部分甚至改动了原意。1920 年 4 月韦伯故去，遗孀玛利亚娜为他编辑文集，将这两篇分别收进《科学理论论文集》和《政治论文集》，两篇演讲得以流传。本书即由两部文集收录的修定篇译出。这次中译本再版修订时参考了 1992 年德文版《马克斯·韦伯全集》第 17 卷（以学术为业 / 以政治为业）。

“业”是一个伦理概念

韦伯所说的业很有讲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业’概念”里，韦伯做了一个将近 3 页长的注释^①，专门讲这个业。德语里的 Beruf，现在是职业的通称；古德语的名词 beruof，原意是信誉、声名，动词则有感召之意。马丁·路德翻译

^①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文集》，蒂宾根：J. C. B. 莫尔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3—65 页。

《七十子圣经·西拉子智训》第12章第20、21节时使用了这个词的动名态 Berufung，使希腊原文中的“职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义。从此 Beruf 成了职位，授予官职叫 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职，要由大学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长任命，某人被任命为教授，叫作“奉召做教授”。韦伯的两篇演讲的题目使用的也是 Beruf，这个业就有了使命的含义，不是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作为使命的职业，伦理之业，或者叫天职。因此，韦伯的两篇演讲不同于他的以往的学术著作，包括早期的法学和国民经济学著作及成熟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著作，也不同于他在“一战”中和战后的大量政论文及政治演说，因为讨论的对象是具有伦理价值的职业，所以它们更像哲学论文。

以学术为业

作“以学术为业”的演讲时，韦伯是自由人。14年前他辞去海德堡大学的教职，那门受罪的国民经济学课，毁了他的健康，耗干了他的激情。开课那几年，他成了频频请病假的老病号，一篇文章也没写出来。辞职以后，韦伯完全换了一个人，病好了，学术成果累累硕硕，参与创办《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期刊，完成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以及包括《儒教与道教》在内的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部分研究。此外还有不少政论文，特别是宪政论文。今天韦伯全集收录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这个时期。这期间，韦伯不仅学术多产，还频频参加社会活动，参与成立德国社会学会，在海德堡的家里开着星期天沙龙，还经常外出开会演讲。仅1917年就去图灵根参加了两次劳恩施泰因文化大会，一次在圣灵降临节期间，一次在9月。劳

恩施泰因古堡的这个著名活动是出版商欧根·迪德里希^①主办的，旨在把学术界、文化界、政界的名流介绍给年青一代，可见那时韦伯已是抢眼的名人。9月会议的主题是“政治与文化生活中的领袖问题”，由韦伯做开幕报告“名人与生活秩序”，讲现代社会的政治领袖。^②他自己扮演的恰恰是这样的角色，在不少年轻人心目中，韦伯就是他们的政治领袖。两次会议之间，韦伯受慕尼黑进步人民协会邀请去慕尼黑讲过“德国人民对德意志帝国宪法委员会的期待是什么？”^③这一年的夏天，他还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批判德国的官僚体制和政党制度。^④

不当教授的时间里，韦伯有过一段军旅生涯。1914年7月“一战”爆发，50岁的韦伯毫不迟疑地报名入伍，被分配到海德堡后备野战医院委员会担任纪律检察官，算是就地从戎。每天13个小时的办公室工作一直持续到1915年9月30日后备医院解散。韦伯奉命退役，一起从军的二弟^⑤和最小的妹妹的丈夫^⑥却再也回不来了。

1917年11月7日，韦伯演讲的听众也是一个刚刚经历了战争

① 欧根·迪德里希（1867—1930），有影响的德国出版商，以出版文学、艺术和哲学著作著称。

② 关于韦伯在两次文化会议上的发言和报告，参见《马克斯·韦伯全集》德文版第15卷第701—707页，没有全文，只有报道和斐迪南·滕尼斯的手记。

③ 参见前引书第710—719页《慕尼黑最新新闻》、《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和《慕尼黑报》的报道。

④ 这些文章后来由柏林Duncker & Humblot出版社结集出版，定名为《新组建的德国的议会与政府》，见前引书第432—596页。

⑤ 韦伯的二弟卡尔1915年阵亡。

⑥ 韦伯最小的妹妹莉莉的丈夫赫尔曼·舍弗尔，“一战”开始不久即死在波兰战场。1915年8月，韦伯曾陪妹妹去波兰扫墓。

的年轻群体，同一天发生的德皇威廉二世赞助的俄国革命^①丝毫没有冲淡人们对战局的悲观，沉闷的会场上下交融。韦伯像和自家兄弟谈心，和盘托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感受和伦理认同，引导立志以学术为使命的年轻听众走上他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韦伯从德国和美国大学的人事体制对比入手，先介绍了在德国大学从事学术或者说做教授的前提和程序，然后进入学术工作本身，逻辑与方法是定位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提升研究的知识价值；即有新意，学术工作才有意义。然后韦伯进入学术的内核——把学术作为人生使命，奉内心召唤，献身学术事业。韦伯将献身精神提到人格的高度，“只有纯粹献身于事业的人，才有‘人格’可言”。在韦伯心里，献身是普世伦理，不仅学术领域如此，做什么都要全神贯注。比如文学创作艺术，“纵然像歌德这样的大家，当他冒昧地想把自己的生活当成艺术作品时，在人格上也受到了报复”。他特别鄙视在学术界“以戏班子班头自居”的人，他们“把自己应当献身的志业，拿到舞台上表演，想借助‘阅历’证明自己了不起……这种人肯定没有‘人格’”。今天，这种现象大量上市，处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也降低了当事人的人格。这种人问，如何才能出人头地，而不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任务——仅仅是任务。这种全神贯注，能把一个人提高到他准备献身的志业的高度，给他以使命感和尊严”。这些话今天依然如高悬明镜，照出伪学者心里藏的“小”来。在韦伯眼里，他们是没有人格的存在物。

韦伯反对在学术研究中采取某种立场，学术研究避不开诸神之争，真的未必善，善的未必美，美的未必真，效忠某一位神，势必

^① 参见维格莱弗、克劳斯等：《陛下的革命家》，载《明镜周刊》2007年第50期，第34—44页（Wiegrefe, Klaus u.a.: "Revolutionär seiner Majestät", in: *Der Spiegel* Nr.50 /2007.）。

得罪别的神。在诸神之争中，韦伯主张忠于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得出终极的、内在的、有意义的结论。韦伯将此视作为道德力量效劳，有责任感而恪尽职守。这些教导发自肺腑，赋予演讲深厚的哲学意义。

演讲中也有言不由衷的地方，比如反对教师把政治理念带上讲坛，不赞成学生把教师视为政治领袖。韦伯实际做的恰恰相反，他在弗赖堡大学的就职演讲就是一篇民族主义宣言，把国民经济学定性为“民族持久权力利益的婢女”^①。“以学术为业”演讲之前两天，他还在慕尼黑超党派群众大会上做题为“反对泛德意志危险”的讲话，提出“永不结城下之盟”的口号。当时媒体报道，“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作为学者，而是作为政治家来讲话的”^②。在学生心目中，韦伯早已是他们的政治领袖，尤其是在劳恩施泰因古堡会议之后，领袖宣传立竿见影。这时候韦伯再来反对讲坛上的政治理念，反对学生对教师的政治崇拜，越发言不由衷。

① 韦伯在就职演讲中如是说：“德意志国家的国民经济学和德意志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家只能是德意志的……我们要教给后人的不是和平与人类幸福，而是为保存和发展我们的民族之种而无尽斗争。我们不能乐观，以为最大可能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就大功告成了，发展成就高的民族会借助自由和平的经济竞争成为胜者。我们要对历史负责的，首先不是传给后人什么样的国民经济组织，而是我们从世界上争来并给后人留下多大的活动范围。权力斗争最终也是民族权力利益的经济发展过程，民族权力利益受到质疑时，就是终极的决定性的利益，经济政策要为民族权力利益服务，国民经济政策学是一门政治科学。它是政治的婢女，不是行使统治的掌权者和阶级的日常政治的婢女，而是民族的持久权力利益的婢女。”（《马克斯·韦伯全集》第4卷第560—561页。）

② 参见《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5卷第724—725页，《慕尼黑最新新闻》的报道；关于韦伯的讲话及媒体评价还可参见该书第726—732页，《慕尼黑—奥格斯堡晚报》、《慕尼黑邮报》和《巴伐利亚信使报》的报道。

以政治为业

到了“以政治为业”演讲时，情况又发生了巨大变化。德国输了自己的战争，用韦伯的口头禅来说，德国人如今成了“政治贱民”。德国政体正在从根本上变革，由君主制走向共和。这期间韦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瑙曼^①共同创建德国民主党。他的统治社会学已成为社会话题，^②“合法统治的三种类型”已经定型。来慕尼黑之前，他在维也纳大学开了一学期“经济与社会”课，专门讲统治社会学。无论从政治学的角度还是从政治实践的角度，韦伯都有资格讲这个题目，但是他选择了另一个角度——哲学的角度，把演讲重点放在政治家的伦理上。

卡里斯马政治领袖

韦伯从他的三种类型中专门提出卡里斯马统治来，因为卡里斯马领袖最富有为政治献身的精神，是真正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与为了生计而从政的人有本质的区别。韦伯把依靠服从者对“领袖”纯个人的“卡里斯马”的皈依的统治看成政治事业的最高表现。对先知、军事领袖或民众领袖的皈依意味着，这个具有卡里斯马的个人在人们内心深处是天降大任的领袖，人们不是根据习俗或章程来服从他，而是出自对他的信任，皈依的是他的人格人品。

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个人前提呢？韦伯提出三个对于政治家特别重要的素质：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热情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责任感就是把对事业的责任当作行动指南，判

① 弗里德里希·瑙曼（1860—1919），马克斯·韦伯之友，德国民主党第一任主席，魏玛议会成员。

② 参见《马克斯·韦伯全集》第22卷第3册第752—758页，新自由社报道。

断力是沉静地面对现实的能力，对事对人的分寸。韦伯把“没有分寸”看成是一切政治家的不赦之罪之一。政治“人格”之“强”，在于具备这些素质。“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韦伯这句话如今仍常被德国政治家引用。

韦伯也承认，在卡里斯马统治类型中，领袖并不是权力之争中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更重要的倒是他们所拥有的辅助手段。任何政治暴力统治都需要一定的外在物质手段，卡里斯马统治靠的是领袖的追随者和信徒。但人们不是白追白信，而是相信追求这个人会得到报偿。领袖也必须给追随他的人报偿：精神的报偿，如报仇雪恨；物质的报偿，如官职奖赏，即政治学所谓的“分赃”。

领袖与追随者之外的广大群众，作为被统治者，他们对领袖的崇拜和狂热从何而来？韦伯以英国为例，指出为了运动群众，而加强了纯粹的情绪手段，这是“建立在利用群众情绪基础上的专政”。茫然无知的群众只有通过宣传才会被鼓动起来，为领袖及其追随者所用。政治宣传与宗教传道及经济广告都是通过传播手段达到争取人的目的，依靠人气的卡里斯马领袖更离不开宣传。希特勒1924年在《我的奋斗》里就已指出：“宣传的艺术在于，把握广大群众情绪化的想象天地，用心理学上正确的方式找到通往广大群众的注意力和心田之路。”^①

囿于时代，韦伯难以看到这种建立在个人崇拜基础上的统治类型的极权走向。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韦伯把伦理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

^① 参见：<http://de.wikipedia.org/wiki/NS-Propaganda>。

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不是说，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究竟是按信念伦理准则行事——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还是按责任伦理原则行事：就是说，当事人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区别类似中国 80 年代初的“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不过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基于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基于“善”，不同于基于个人崇拜、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两个凡是”。韦伯批判信念伦理，不是批判它追求“善”的目的，而是“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了”。他断定，用目的神化手段，信念伦理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只有一种逻辑可能，那就是摈弃任何使用道德上危险手段的行动”。除了逻辑上的难题，韦伯进一步指出信念伦理不能回避的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的关键时刻，一向标榜以爱还暴、以德报怨的信念伦理家，往往“大声疾呼使用暴力，最后的暴力，它会带来消除一切暴力的局面……这是最后一次，它将带来胜利与和平”。信念伦理家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是宇宙伦理的“理性主义者”，“受不了世界上伦理的非理性”。

韦伯对付信念伦理悖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到政教分离，回到马丁·路德，把对战争的责任从个人肩上卸下，转给政府。在他看来，除开信仰，个人在任何事情上服从政府，这当然也包括使用暴力，都不会有罪。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政治伦理的特殊性，这是由人类团体掌握的合法暴力的专门手段决定的。任何人，特别是政治家，不管为了何种目的同意采用这种手段，都必须跟着它的